



什叶派的吉哈德观

■ 李福泉

吉哈德（Jihad）是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尽力”、“奋斗”，伊斯兰教中引申为“为安拉之道而奋斗”。吉哈德是一个多维概念，其含义在保持一定稳定性的同时，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穆斯林对吉哈德的诠释各有侧重，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作为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什叶派经历了不同于逊尼派的历史发展道路，其吉哈德观由此也具备了一些独特的个性。什叶派教派的地位和伊玛目教义给其吉哈德观打上了深刻烙印。

一般而言，与逊尼派一样，什叶派也把吉哈德分为大吉哈德和小吉哈德。大吉哈德就是战胜自我，与自身的私欲作斗争，它伴随穆斯林的一生，是没有条件的限制。小吉哈德就是用剑捍卫伊斯兰教以及穆斯林的生命、财产和领土。它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进攻性的吉哈德。什叶派认为，先知之后只有不谬的伊玛目才有权利发动这种吉哈德。当十二任、也即最后一任伊玛目在874年隐遁后，世间便再无人享有这一权利。对此，什叶派内部基本没有分歧。可以说，这一观点是与什叶派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政治现实相一致的。第二种是防御性的吉哈德。早期什叶派宗教学者认为，这种吉哈德只有在伊

玛目的领导之下才能进行，当最后一任伊玛目隐遁后，任何国家、宗教机构和宗教学者都无权代表伊玛目，也就不能发动吉哈德。这就意味着，由于吉哈德的唯一合法的发起者——伊玛目已经隐遁，进行吉哈德的条件不复存在。由于此，一些乌里玛甚至避免以“吉哈德”指称隐遁时期穆斯林的防御性战争。什叶派阿赫巴尔教法学派便是持这一立场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一看法虽然维护了伊玛目的权威，突出了伊玛目在什叶派穆斯林中的至上地位，却使什叶派丧失了动员穆斯林反击压迫和侵略的有力武器。因此，许多什叶派领导人和乌里玛对此提出了异议，乌苏勒教法学派的乌里玛尤其如此。伊朗卡加王朝时期，面对俄国的侵略，什叶派乌里玛在1804年和1826年两次发布法特瓦，号召穆斯林对俄发动吉哈德。1812年，宗教学者卡什夫·基塔（Kashif al-Ghita）宣布，在伊玛目隐遁时期，拥有教法创制权的穆智泰希德肩负着通过吉哈德捍卫伊斯兰教的职责。

什叶派内部之所以出现这种分歧，关键在于对隐遁时期伊玛目的权威问题无法达成一致。阿赫巴尔教法学派认为，所有人都是伊玛目的追随者，在伊玛目隐遁后，除非他指定，否则任何人无权代行其宗教和政治权

威。以萨法维王朝（1502—1779）国王为代表的什叶派统治者则宣称，他们是隐遁伊玛目在世间的代表。这一政治主张得到了当时部分什叶派乌里玛的默认和支持。与阿赫巴尔教法学派相反，乌苏勒教法学派强调什叶派教法学家的地位，把他们视为伊玛目的代理人和其权威的合法行使者。19世纪初期，在与阿赫巴尔教法学派的斗争中，乌苏勒教法学派取得胜利，此派的教法观点就此成为什叶派中的主流。随之，宗教领袖有权发动吉哈德的观点开始逐渐被大多数什叶派所接受。

进入20世纪，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伊斯兰世界，穆斯林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面对这“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穆斯林知识分子和宗教学者对伊斯兰教的某些教义功修进行全新的解释，以适应反侵略的需要。吉哈德在什叶派（包括逊尼派）宗教政治话语中的地位前所未有的地凸显。实际上，现代所有重要的什叶派知识分子和宗教学者都对吉哈德做出了评述，有些甚至还撰写了相关的论文或著作。比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家霍梅尼（1902—1989）有《论大吉哈德》，阿里·沙利亚提（1933—1977）有《吉哈德与殉道：论舍希德》，伊朗阿亚图拉马赫茂德·塔莱卡尼（Muhmud Taleqani, 1910—1979）和穆尔塔扎·穆塔赫利（Murtaza Mutahhri, 1920—1979）分别有《吉哈德与殉道》和《吉哈德》，黎巴嫩著名宗教学者侯赛因·法德拉拉（1935—）和马赫迪·沙姆斯丁（1936—2001）分别有《吉哈德之书》和《伊斯兰教中的武装暴力教法学》。这些学者无一例外都认为，在当前伊斯兰教面对威胁的情况下，吉哈德是无可置疑的合法行为。不仅大吉哈德依旧是穆斯林伴随终生的宗教义务，防御性的小吉哈德也是每个成年男性穆斯林不可推卸的宗

教职责。后一种吉哈德并不需要伊玛目的授权，在世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即可发动。在这时，大吉哈德依然受到重视，霍梅尼就认为，大吉哈德是其他吉哈德的基础，没有大吉哈德，其他吉哈德无法进行。但是，小吉哈德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强调。而且，吉哈德本身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防御性吉哈德的措施不仅仅限于暴力，非暴力也是重要的方式，因此出现了“政治吉哈德”、“经济吉哈德”和“文化吉哈德”等提法。黎巴嫩真主党便把内战后参与议会选举的活动称为“政治吉哈德”。

由于国情和知识背景不尽相同，什叶派思想家有关吉哈德的论述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具有以下特点。它们构成了现代什叶派吉哈德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强调吉哈德必须以反对专制和侵略、捍卫自由为目标。什叶派普遍认为，他们在历史上备受排挤、歧视和压迫。对不公正和非正义的历史感受和集体记忆给什叶派带来了深刻影响，追求正义、反对强权成为其政治思想的关键内容，而现代什叶派思想家都无一例外地都强调吉哈德的这一功能。

第二，强调殉道（shahadat）的神圣性。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自杀。但是，现代什叶派思想家认为，在吉哈德中与敌人同归于尽，根本不是怯懦的自杀，而是为了安拉而殉道的勇敢行为。殉道是穆斯林对安拉的最伟大、最崇高的奉献，而在什叶派看来，侯赛因是历史上舍希德（烈士、殉道者）的最佳典范。

第三，强调抵抗的必要性。在什叶派历史上，受难与抵抗犹如硬币的两面，是同时并存的两种现象。不过，虽然什叶派认为自身遭受着压迫，但鉴于力量的弱小，消极无为是他们大部分历史时期政治态度的主流。塔基亚原则作为普遍遵行的宗教义务，使什

叶派长期缺少了侯赛因式的斗争精神。进入现代社会，这种政治态度被视为什叶派政治动员的严重障碍。因此，为了实现什叶派的政治化，现代什叶派思想家严厉批判塔基亚原则，号召穆斯林积极行动起来，以抵抗回应非正义。塔莱卡尼和穆塔赫利都认为，愤怒是每个人进行自我保护的本能，在面对压迫时，按安拉之道表达愤怒，进行抵抗，是必要而合理的行为。在长期遭受以色列侵略的黎巴嫩，抵抗成为最流行的话语之一。

第四，强调尊严的重要性。对于长期处于弱者地位的什叶派而言，尊严具有特殊的意义。思想家们认为，当穆斯林的尊严受到侵犯时，发动吉哈德是合法的行为。塔莱卡尼宣布，吉哈德的原则是人必须捍卫自身的权利和尊严。穆塔赫利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屈服换取和平，因为这种投降的做法只会让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遭受屈辱。在沙里亚提的笔下，舍希德为了尊严，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所谓的吉哈德，就是要捍卫穆斯林的荣誉和生命。在法德拉拉看来，抵抗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护人的尊严，抵抗赋予人生活的意义，使其不再受到敌人的藐视和欺凌。

第五，强调吉哈德对象的有限性。究竟谁是吉哈德的合法打击目标，穆斯林内部向来存在争议。长期以来，逊尼派武力性质的吉哈德只以非穆斯林为对象。到14世纪，伊本·泰米叶（1263—1328）把不实施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统治者（指蒙古人）纳入打击的范围。20世纪，赛义德·库特卜（1906—

1966）号召以剑发动吉哈德，推翻穆斯林国家的贾希利耶（蒙昧）政权，而本·拉登更是明确主张以吉哈德推翻沙特等国政权。什叶派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如上所述，现代什叶派思想家要求以吉哈德反对专制，但其对象往往不是本国的穆斯林统治者，而是美以等侵略者和占领者。沙姆斯丁指出，对穆斯林发动吉哈德是非法的行为。因为在他看来，不建立伊斯兰制度并不能作为判断统治者是叛教者的依据，如果统治者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并接受他的启示，那么他就不能被视为异教徒，也就不能被当作吉哈德的合法打击对象。在两伊战争期间，霍梅尼并没有把这场战争描述为吉哈德，而是称之为“伊拉克强加的战争”。在黎巴嫩，法德拉拉明确宣布，什叶派吉哈德的对象不是本国政府，而是以色列占领军。此外，与基地组织以平民为目标不同，穆塔赫利坚持认为，穆斯林只能打击侵略者，武力吉哈德不得以非参战人员为对象，而且，战争中也不得出现故意破坏敌人经济资源的“过分行为”。法德拉拉虽然支持自杀式袭击，但坚决反对打击普通平民，正由于此，他严厉批评9·11事件等基地组织发动的袭击行动。

显然，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什叶派思想家对吉哈德的解释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意义。实际上，20世纪中东各国什叶派普遍实现了政治化，上述吉哈德思想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当然，由于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教义，什叶派的吉哈德观带上了一些有别于逊尼派的教派色彩。

